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易新农 夏和顺著

容庚傳

選書
夏和順



■ 我是野馬 我是鬼鎖 ■



容庚傳

易新农 夏和順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容庚传 / 易新农, 夏和顺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360-6123-1

I. ①容… II. ①易… ②夏… III. ①容庚—传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614号

策划编辑: 倪腊松
责任编辑: 路 华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5.25 1插页
字 数	410,000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册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前言

一

1951年10月，杜国庠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演讲，盛赞岭南大学教授陈寅恪、容庚，可谓眼光独到，他为陈、容二人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定下了基调。

陈寅恪一直张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其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复》更是振聋发聩。容庚则自谓“野马”、“鬼锁”，狂放不羁，直言不讳，在历次运动中都留下了堪称经典的言论，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他是一面飘扬不倒的旗帜。

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1925年，他以一部《金文编》蜚声学界。他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著述不断，成就斐然，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商周彝器通考》。直到“大跃进”、“文革”期间，容庚被立为要拔除的“白旗”，被批为中山大学的“三家村”，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这样的重要著作。

二

从1922年北游京师，问学罗振玉，入读北京大学国学门，到1983年去世，容庚的学术生涯横跨20世纪之中的60年。

容庚生于一个革命的年代，后人总结他的学术成就，将其一生分为两个时

期，即北京时期和广州时期。其实他一生 90 年特别是其学术生涯 60 年，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战争时期，后期则是斗争时期。

他父亲曾希望他能成为一员武将，虎虎杀敌，但他最终却成为一介文人，终身教书写字为业。生活在那样的年代而为文人而从事学术研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艰辛外人难以想象。总的来说，容庚在北京时期或者说战争时期的学术成果富于广州时期或斗争时期，究其原因，除前一时期他更加年富力强，更富有学术创造力外，当时北京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生活环境也起了重要作用。

容庚南归后无法致力于自己长期经营的彝器铭文研究，甚至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曾宪通在《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一文中说：“先生南归以后，由于南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资料十分匮乏，甚至连求一个拓墨的人也不容易，苦无用武之地，于是便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碑帖书画方面来。这一时期，先生无论对竹谱的研究，对倪瓒画的研究，对飞白书的研究，以及对淳化阁和澄清堂法帖的研究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一般人看来，容庚后期治学，成果同样丰硕，但他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常常对人说，自己的所谓成就都是在燕京大学完成的，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如果硬要找出一个客观理由，说是因为南方资料匮乏，也未尝不能自圆其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根本原因是政治环境的变化，1949 年以后，容庚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已不复存在。

三

1958 年 3 月 18 日，反右斗争尘埃落定，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董每戡、叶启芳、詹安泰、吴重翰、卢叔度等被打为右派反党小集团，容庚仍为他们奔走呼吁，希望有关方面放他们一马。学校领导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他坐在台下大声回应：“我退休！”对方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休。”

1958 年“向党交心”运动中，容庚又有许多精彩言论。据陈世铎日记，容庚说：“这几天，我的思想很沉重。思想像竹子，有些地方通了，有许多地方还是不通……”对所谓学生给老师“送礼”，他说：“口头上说是送礼、送礼，实际上就是批判，跟批判胡适一样。”

在自我检查中，容庚发表了许多“奇谈怪论”，比如他用问答的方式写道：“右派损害党的利益，你能起来和他们斗争吗？我说有怀疑。”“右派是你的敌人吗？我说有怀疑。”“党和政府的政策你宣传过吗？我说宣传的少，而反宣传的多。”他还对来访的同学们说：“他们叫我参加九三学社，我没有参加，所以没有成为右派。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许德珩号召别人鸣放，他没成右派，别人倒成了右派。要划谁，谁就是右派。”

1966年5月，全国都在批判吴晗、邓拓，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容庚仍在会上为吴晗、邓拓喊冤叫屈。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燕山夜话》）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谁敢提意见，这不是防民之口吗？这样防民之口，只好挂个牌牌‘莫谈国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台湾不是又该说我们兴文字狱，焚书坑儒了吗？”会议主持人问他：“不管台湾如何看，你自己看是不是文字狱？”容庚非常直白地说：“我看有点像文字狱，这也反党，那也反党，反正大家都没有看出来。”就这样，容庚成了中山大学的第一批“牛鬼蛇神”，与刘节、谢文通并称康乐园里的“三家村”。

1971年10月30日，批林批孔运动中，中文系教职工学习中央文件，容庚说：“但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指林彪）走这条路？有一点是‘斗争’，逼着他走上叛党叛国的道路，是斗争哲学的结果。”“斗争斗争，我心里一直不安，斗来斗去，莫须有。”“不说又不行，沉默就是反对，又一条罪状！究竟怎样做人好？如果七八亿人都拥护，中国是无敌于天下的。可是现在还有两种人，把话闷在心里，不敢说话，这不是好现象。”“整天喊思想改造，越改造越坏。”

在当时，有谁敢说这样的话？全国找得出几个？

这就是容庚。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依然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作悖理之事。”这是对容庚最直白、最平实的赞誉。

容庚同样承继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风骨傲然，令人景仰，是康乐园里足以与陈寅恪比肩的大师。

四

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不随风俯仰，是那一代

学人思想和人格的精髓。

容庚的学术地位，有家学渊源，有自己的勤奋努力，当然也有那个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从他的学术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学术道路选择和独立自由人格确立的轨迹。

容庚与罗振玉、王国维、林白水等人的交往很有传奇色彩。1922年，容庚带着《金文编》初稿北上求学访师，在天津拜见罗振玉，罗对他十分赏识，介绍他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攻读研究生。这样，只有中学学历的容庚成了北大早期研究生。1925年，《金文编》初版问世，也是罗振玉出资帮助印行的。为表示感谢，以后《金文编》每次再版，他都要寄一份稿费给罗的家人。

因为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也成为容庚的老师。在治学道路上，王国维对容庚帮助很大。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此前数日，曾到容庚位于燕东园的寓所长谈，王国维死后，容庚也是第一批到达现场者，他还一直保留着王国维遗书的石印件。“文革”中，容庚“宁跳珠江，不批孔子”，这无疑 是王国维宁折不弯个性的精神延续。

林白水为20世纪初著名报人，与邵飘萍齐名。容庚曾任林白水女儿的家庭教师，有一次林家车夫作梗将容庚抛在半途，林白水获知后立即辞退车夫，并叫女儿向容庚磕头请罪。容庚回到林家讲课，林白水见到他又亲自向他下跪谢罪。容庚十分感动，两人遂成莫逆之交。林白水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杀害后，容庚集林白水文章成《生春红室金石述记》一书，以资纪念，并作跋颂扬林白水“视权贵蔑如也”。“视权贵蔑如也”也是容庚精神的写照。

1929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以“未知友”署名给容庚写信，以寻求甲骨文研究资料，容庚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他无私地将自己所能搜罗到的资料全部寄给郭沫若。但对郭的政见和热心政治的行为容庚并不苟同，他曾在信中劝郭埋头于学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写信劝郭回国抗日。1946年，容庚在重庆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相谈并不欢畅，他事后与人谈起，用“退院之僧”来形容郭，意指郭不务正业。

1962年3月，“康生驱车访容庚”，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传为奇闻。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在“黑石屋”与容庚谈论文物收藏、书画鉴定，两人因容庚所藏《兰亭集序》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令在座的中山大学领导目瞪口呆。正因如此，康生敬重容庚的学识和不畏

权威的胆量，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还亲自为他开具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的介绍信。

五

写《容庚传》，不能回避 1942 年—1945 年容庚任教伪北京大学一事。我们无意为贤者讳，平心而论，任教伪北大是容庚一生中的最大失误，他的后半生也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容庚也有其初衷和难处，就事论事，傅斯年高调地指责“伪教授”，甚至“伪学生”，在当年就受到部分学人批评；容庚致傅斯年信中自辩“人有子女，待教于我；我有子女，亦待教于人”，是合情合理的。

不少中外学者对那一段历史做过详尽研究后认为，“学校伪而教授并不伪”，本书中已作部分引述。周启博在《我的父亲周一良》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中共要人的也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向国民党当局反弹，中共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周启博文中对“独立人格”的理解，但他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认为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生命、个人权利，而中国文化则强调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这确是我们理解当年“伪教授”事件的一个关键。借此写《容庚传》的机会，让我们反思中国式的思维或中国文化的缺失，应是不无裨益的。

六

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孔子述而不作，或许以为三者之中言是最次要的。容庚虽自谓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但他依然达到了中国传统学人的标高。

容庚是一个传说，是一个时代不朽的记忆。容庚蜚声海内外，桃李遍天下，每一个热爱他、景仰他的人都有关于容庚的不同的记忆，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容庚形象。我们写作《容庚传》因此受到鼓舞，也受到挑战。

我们理解，容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古文字、青铜器和书画研究方面的成就，二是他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所作出的贡献。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后者显得尤为重要。

人物传记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文学，是用文学语言再现传主历史风貌的一种体裁。撰写人物传记，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传主的著作、日记、题跋、往来书信、档案资料是第一手资料，同时代人物的日记、回忆文章等虽属第二手资料，但作为写作时的参考与佐证十分重要，不可忽视。

容庚著作等身，其《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更为学界奉为主臬。我们在写作中，有幸得曾宪通、张振林等专家指点，对容庚著作进行了研读，其中涉及生平、学术活动、友朋往来者成为传记重要内容。容庚一生与学界名流交往广泛，并有大量书信往来，这些往来书信部分收入《郭沫若书简——致容庚》、《郭沫若致容庚书简》、《陈寅恪集·书信集》、《王国维全集·书信》、《容庚法书集》、《颂斋珍丛》中，另有一批散见于各类书刊，我们广为搜求，从中获益不小。

容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表现出一位学人的铮铮铁骨。容庚言论往往切中时弊，独具风采，因而时时被人传颂。但传颂中的容庚言论（包括时人所写回忆文章）往往又与本来面貌存有出入。我们在写作本传时，查寻参阅了中山大学档案馆容庚档案材料，应为当时言论的确切记载，当为信史。

武汉大学陈世铨教授是中大大中文系 1956 级学生，他有记日记的好习惯，且是用自己特别的速记法，别人看不懂。我们写作本传，得其慷慨应允，将当

年日记中有关容庚的记载抄录寄赠，实为难得！陈世铄日记给本传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比如1958年夏，容庚在虎门写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当年的同学虽然都有所记忆，但最完整的是陈世铄日记所载。

稍感遗憾的是，容庚生前收藏的还有一批日记，如其家属捐赠中山图书馆的那一批，我们还不得而见；容庚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多关乎学术与交往，但却仍未对社会开放。我们仍然关注着上述文献资料，希望本书如有重订再版机会时能够加以利用。

七

罗家伦在为蒋梦麟《西潮》（台南文国书局1986年12月初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若当时的人不予以记载，则后起的人更无从知道，无法了解。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

撰写《容庚传》是作者的夙愿。数年来，两位作者深入容庚故里东莞，采访容庚子女、学生及生前友好，查寻中山大学档案馆容庚档案资料，广泛收集容庚生前著作，参阅大量的有关容庚的回忆文章，认真创作，终于完成这部逾30万字的传记作品。

作者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连缀大量历史的片断，再现出真实、生动的容庚形象，同时，通过容庚的生平遭际进行深刻的反思，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倡言回归学术传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者才疏学浅，力不从心，上述目标因而未必能在我们笔下实现。本书错漏难免，欢迎各位方家不吝赐教，匡我不逮。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北上求学	1
世代书香	1
北游结识罗振玉	7
走进北大国学门	11
《红楼梦》与古史辨	16
第二章 故都旧事	25
《金文编》问世	25
“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	30
故宫的文物海洋	34
视权贵蔑如也	37
第三章 燕大教授	41
受聘燕京大学	41
主编《燕京学报》	47
诀别王国维	53
“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	59
第四章 钟鼎彝器	67
购藏青铜器	67
颂斋与善斋	72
神交郭沫若	78
与郭沫若的隔阂	84

90	第五章 考古学社
90	考古旅行
94	“颂斋之会”肇其端
98	治甲骨选铜器
102	著录青铜器
107	鸟书与石刻
112	第六章 抗日学者
112	组织抗日十人团
116	百名教授抗日宣言
121	通俗读物与《史地周刊》
128	第七章 北平沦陷
128	寄情山水图画中
133	琉璃厂淘宝
138	燕园沦陷
143	伪北大教授
148	战后“劫收”
153	与傅斯年的抗衡
159	第八章 回到岭南
159	见证岭南大学的辉煌
165	自由主义的教学方法
170	学术研究的最后高峰
176	陈寅恪助教风波
183	第九章 静观事变
183	进入新社会
189	“美帝分子也有好人”

康乐园易帜	194
“地主阶级是敌人，地主不是”	198
第十章 惊心动魄	204
“几十年的思想不易改造”	204
辞谢中科院商调	209
“胡适治学态度值得学习”	214
怀疑肃反运动	219
第十一章 早春气象	224
奉派赴港统战钱穆	224
支持简化汉字	230
批判陈梦家	235
招收古文字学副博士	238
绿绮台琴与二级教授	242
第十二章 悬崖勒马	248
“秘密秘密，多少罪名假汝以行”	248
为右派分子喊冤叫屈	252
与王起比赛加入共产党	258
老师“交心”学生“送礼”	265
“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	269
第十三章 红专白专	275
大跃进和拔白旗	275
虎门风波	279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285
增订《金文编》与北上考古	290
“先到党部来报到”	295

301	第十四章 野马鬼锁
301	“歌颂海瑞没有什么不好”
305	“我看有点像文字狱”
311	砸“鬼锁”、宰“野马”
315	扫地出门
322	内查外调
329	第十五章 批林批孔
329	“林彪造反是斗争哲学的结果”
334	因“文物外交”获“解放”
339	“批林就批林，为何又要批孔”
344	批林批孔批容庚
350	“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
356	第十六章 余霞满天
356	“我还是我容庚”
362	“我不交不读书的年轻人”
366	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372	“聚实不易，散则何难？”
377	立德立言俱不朽
380	附录：颂斋自订年谱
388	主要参考书目
390	后记

第一章 北上求学

世代书香

1922年6月23日，28岁的容庚留下妻子儿女三人，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游京师，希望在文物汇聚之地增补《金文编》以成定稿。当时他或许没有想到，此行将完全改变其人生轨迹。

容庚于1894年9月5日（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出生于广东东莞县莞城镇，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容斋，因“容”“颂”古通，他后来便以“颂斋”名其室。

东莞容氏为晚清书宦世家，容庚对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至感荣幸，他在手稿《我的回忆》中写道：“在满清二百九十六年当中，科举中的人在我的县里如晨星寥落的，我的家能够挂上‘父子科甲’的匾额，且科甲的前后尚有些岁贡，附上拔贡的人们，‘世代书香’更足以夸耀闾里。”^①

容氏家族自宋代时南迁广东，其第九代致政公由新会迁居东莞板桥村，是为东莞支初祖。东莞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土地膏沃，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宜农耕。容氏家族在这方土地上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历数朝数百年之久，至二十六世容宽（1719—1782）开始崛起。容庚称其“善冶生富至鉅万”，容宽迁居莞城旨亭街，“迄今旨亭街第宅皆公遗也”^②。

容庚祖父容鹤龄（1831—1897），字翥云，号青田，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并补行戊午科举人。容鹤龄父亲因会试病歿，母亲本不愿让他进京，后

① 容庚手稿《我的回忆》，现存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纪念馆。

② 容庚：《容氏家乘》册页手稿，见李炳球选编《颂斋珍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4页。

经亲友力劝，容鹤龄才得以成行，遂中癸亥恩科第七十三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八名，授知县。鹤龄并未赴任，奉母家居，改授韶州（今广东韶关）府学教授，援例为六部补用郎中。后任东莞龙溪书院及顺德凤山书院院长十余年，奖掖后进，成绩斐然。容庚称他“作了十几年龙溪书院的院长，成就的人才甚多，隐然为当时士大夫阶级的领袖”。^①

容庚之父容作恭（1872—1908），字朝昌，号邝南。喜治史学，作诗填词，藏书万卷，诵读不辍。作恭于光绪壬辰年进县学，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愤慨难平，常填词赋诗以抒胸臆，其诗受到学使恽彦彬激赏。作恭岁考初试第七，复试拔置第一，补廪生。第二年科考再列第一，被送广雅书院就读，考选丁酉科拔贡。容庚说：“我父亲是一个少子，小于我伯父十五岁，志气明决，是我祖父所最钟爱的。我祖父和我外祖，是顶好的朋友。”^②

容庚的出生是容家的一件大喜事，祖父容鹤龄指示作恭与其兄作求熏沐斋戒，到文昌庙、关帝庙及城隍庙烧香叩祝。其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容作恭欣喜于长子降临，同时忧心国事，因此赋诗一首：

时局正需才，生儿亦壮哉。
高轩一再过，都为试啼来。^③

晚清以来，中国积弱，一般国民尚不能认识。甲午一役，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廷竟然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国人百思不解，义愤填膺。容作恭爱国心切，虽为一介文弱书生，恨不能亲上战场杀敌报国。此时恰逢长子容庚出生，他在诗中对这位襁褓中的幼子充满期望。容庚虽然生于乱世，他长大后却并未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出生入死征战沙场，他曾为自己“不能执干戈，卫社稷，有负祖若父之期许”而自责。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传统报国方式，所谓“武死战，文死谏”，容庚一生学术成就卓越，为人品德高尚，可称“金石铁骨”的一代大师，也算不负当年父亲所寄予的厚望。

① 容庚手稿《我的回忆》，现存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纪念馆。

② 同上。

③ 容作恭：《甲午八月初六日子长庚生》，容庚编《聊自娱斋遗稿》，见李炳球选编《颂斋珍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76页。

容庚出身书香门第，他的外祖父邓蕃镜^①也是进士出身，涵养甚深，曾任广雅书院山长多年。容庚兄弟先是和伯父的长孙一起在家里读书，在伯父的指导下读《礼记》、《诗经》，强调背诵，不求甚解。还读《澄衷学堂字课》和《澄衷小学课本》。

1899年，容庚6岁时，母亲曾延师徐晓湘秀才在家中授读四书。1903年，又延师张鸿安（字于逵）秀才在家中授读《礼记》、《左传》，并点阅王世贞^②编撰的《凤洲纲鉴》。

1905年，东莞安良局开办两等小学，容庚伯父容作求任校长，容庚三兄弟均入读该小学，容庚、容肇新读高等班，容肇祖读初等班。

学校课堂除国文外，尚有算术、植物等学科。但该小学办了不到两年，因经费短绌而停办。此后容作求请一位叫张福清的老师在社学新建而废置的课堂中讲读朱熹《四书集注》，又借容家《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讲解历史。

1909年，容庚四舅邓尔雅^③结束日本的学业回国，在广州启明小学任国文



容庚四舅邓尔雅

① 邓蕃镜（约1831—1901），字上选，号莲裳，东莞莞城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江西督粮道。后因母辞官归里不再出仕，主持广雅书院4年。

② 王世贞（1526—1590），明代著名学者，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能诗，善治史学，也工书画。

③ 邓尔雅（1883—1954），原名溥霖，字季雨，别名尔雅、万岁，东莞莞城人。邓尔雅为容庚外祖父邓蕃镜四子，出生于北京，后来随父亲迁居江西，10岁时始回故乡东莞。为岭南近代著名诗人、书法家、篆刻家。